

R. K. 纳拉扬《向导》中的 生态思想及其启示

杨晓霞 吴嘉敏

摘要：印度英语作家 R. K. 纳拉扬的《向导》描写了处于前工业时期的摩尔古迪小镇天人和谐的生态环境，居民们与自然紧密相依、拥有稳定的住所。然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小镇已不复往昔。进入消费时代的摩尔古迪在工业文明发展观的影响下，自然被商品化，社会关系走向异化，社会个体面临着处所被剥夺、精神被摧残的危险。小说表达了对消费主义和过度现代化的警惕和批判，对处于现代化发展中的印度及印度青年的未来表示担忧。通过描写主人公拉朱在旱灾中的苦修及其在苦修之前的回忆，纳拉扬为现代个体重寻生态理想指出了实践路径。人们通过简化物质生活、积极保护自身的自然性，可以达到新的理想境界。纳拉扬的生态思想受自身成长环境、印度传统自然观以及现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和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杂糅性和有限性的特点，他的生态思想为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态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重申了印度乃至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博大精深，对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启蒙”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生态叙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纳拉扬；《向导》；生态思想；消费时代；处所

收稿日期：2024—08—30

作者简介：杨晓霞（1977—），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文学、东方文学；吴嘉敏（1999—），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东方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为视角”（项目批准号：22JJD750003）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团队项目“女性文学的东方传统研究”（项目批准号：24LJZ01）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标志着印度英语文学正式迈入成熟阶段的印度英语小说三大家之一，R.K. 纳拉扬（R. K. Narayan）在 20 世纪 30—90 年代间笔耕不辍，佳作颇丰，成就主要来自其创作的 14 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因多以虚构的南印度小镇“摩尔古迪”为背景而自成系列，被誉为“摩尔古迪”系列小说。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长篇小说《向导》（*The Guide*），该小说在 1958 年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印度和西方读者的广泛赞誉，获得了印度文学国家奖（*The National Prize*, 1958）、印度文学研究院奖（*Sahitya Academy Award*, 1961）和莲花奖（*Padma Bhushan*, 1964）。

《向导》写于 1956 年纳拉扬旅美期间，彼时随着国大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民主选举中大获全胜，印度开启了致力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转型的尼赫鲁时代，而 1956 年也是印度正式从关注农业转向关注工业并开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关键之年。而同时期的美国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积累的资本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进入政治稳定、物质富裕、文化蓬勃的“黄金时代”。印度从未停歇的社会变革和美国陌生发达的现代景观在《向导》中留下印记，与作家始终着意表现的乡镇图景、生活故事密接紧扣，令其笔下的摩尔古迪进一步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奇幻之地，通过描写主人公拉朱在社会变化之中颇具奇幻色彩的一生，展现出纳拉扬独特深刻的生态思想。

一、《向导》中的生态思想之变

新事物的涌现往往伴随着旧事物的消隐，在印度社会新旧交替的罅隙之间，纳拉扬表达了对二者如何共处的思考。在《向导》中存在许多对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的交叉描写，并且作家似乎有意将二者进行对比，表达了对自然之美和古朴村落的歌颂，对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的迟疑。在纳拉扬的众多作品中，《向导》最为细致地展现了摩尔古迪的现代化开端，而拉朱的成长过程是和摩尔古迪的现代化进程紧密交织的——拉朱身上的自然性随着摩尔古迪的商业化逐渐退隐，他的社会性则随着摩尔古迪现代性的增强而愈发明显，从中也能看出纳拉扬对印度生态历史的概括与思考。

（一）自然之子的生态乌托邦

“现代人似乎已经习惯失去自然根基的日子，不再去想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里会有自己的故乡……惟有那些不安于现状的诗人，还在追忆着往昔的似水年华，憧憬着黄昏与暗夜过后的晨曦。”^① 纳拉扬便是这样一位在回忆与创作中，反复品味故乡之美的作家，而其笔下的拉朱也在对童年往事的追忆中，陶醉于摩尔古迪令人心醉的自然风光，以及人与自然紧密相依的和谐图景。

对童年拉朱而言，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小小天地中，最令他感到乐趣丛生的便是终日在家门前的罗望子树下与动物的游戏：

这是一株古老的大树，枝叶繁茂，成群的猴子和小鸟以嫩叶和鲜果为食，就在那浓密的枝叶间生息、繁衍。那啁啾啼鸣之声，不绝于耳。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了大大小小的猪，用鼻子拱着地上那层厚厚的落叶。我终日都在这里玩耍。我想我当时一定总和那些猪混在一起，玩一些异想天开的游戏，有时我甚至骑在猪背上。父亲的主顾们路过这里时都同我打招呼。我打弹子，滚铁环，还玩一只橡皮球。我玩得几乎忘记了时间，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也几乎全然不知。^②

在纳拉扬的“摩尔古迪”小说中，《向导》最为详细地展现了这座小镇的现代化开端和工业化进程，因此拉朱记忆中这棵古老的罗望子树可以被视为彼时仍属于农业社会的摩尔古迪之象征，它在悠久的历史中积淀下丰富的养分，用以滋养各种各样的生命，为它们的生息、繁衍提供可靠的庇护。在拉朱对往昔的追忆中，猴子、小鸟、大大小小的猪比其他事物更早地涌入眼前，在他与猪群的游戏里，人与动物二元区分的现代观念似乎毫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万物共存于一地的直接感受，是人与非人生命体可以共同游戏的亲密关系。

从出生开始就备受自然滋养的拉朱，对自然的依恋并非出于自身需求的刻意贴近，而是一种顺从天性的行为，更多是一种基于自然情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② 纳拉扬著，李南、王春景译：《向导：纳拉扬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感的下意识举动。这种对人与自然之亲密关系的建构，也常常出现在纳拉扬的其他作品中，热爱自然也成为纳拉扬笔下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如在短篇小说《斧子》中，纳拉扬就塑造了一个将亲手培育的植物视为己出的老园丁形象——他一生独守着一座破败的花园，只为了保护其中的花草树木不被开发商移除，在故事最后他向砍伐队苦苦哀求道：“这是我的孩子。我种下它，我看着它长大，我爱它，不要砍倒它……”^①在纳拉扬看来，亲近自然应当是人类的本能，人对自然的情感深镌于本性之中，只有顺应这种本能，人类才不会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去看待自然，更不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从属关系而企图征服自然。相反，人会以自身最原初的自然身份与万物相处，“依顺着它而非忤逆它生存”^②，并因为感受到与万物共有的自然性而与世界亲密无间，同时赋予自然万物以人的情感，与之共享同一个家园。

纳拉扬曾在参观美国郊外的现代住宅后表示：“如果有人问我不想住在哪里，我会说：‘请不要给我美国郊区的生活。’它很无聊，房子、花园、草坪和狗都是一样的，每个门口都停着两辆汽车，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一家商店，只有一个街区里有邮局、消防站和银行，和全国其他一百个地方差不多。”^③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无地方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景观同质化的现象就越严重。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制作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区域，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整齐地收纳其中，并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名称——居民。在《向导》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印度也正在尼赫鲁的带领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城市化建设，其中“尼赫鲁对新印度的展望可能最为直接地以昌迪加尔的建设展现在旁遮普平原上”^④。为了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步伐，昌迪加尔古老的印度风格犹如耻辱般被大刀阔斧地舍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由笔直的线条和规整的方框塑造的标准的完全现代主义的城市。昌迪加尔是彼时印度的缩影，从中可以窥见纳拉扬眼中那个正在经历生活空间巨变的现代印度。

在生态批评家眼中，全球化的城市景观及其塑造的生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人类个体对自我身份的深刻体认，也对社会个体的群

① 纳拉扬著，李南、王春景译：《向导：纳拉扬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0页。

② 马修·卡拉柯著，庞红蕊译：《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87页。

③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236.

④ 芭芭拉·戴利·梅特卡夫、托马斯·R.梅特卡夫著，李亚兰、周袁、任筱可译：《剑桥现代印度史》，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页。

体认同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对于现代人别无二致的生活场所，纳拉扬也曾在《英语教师》中讽刺地评价道：“孩子会迷路的，不知道哪个是她的家——它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些房子这么像？”^①在作家看来，按照现代标准建造起的房子并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家，它只是一个能为身体提供物理保护的空間，而非一个能够为心灵带来庇护的地方。因此，在故事中，纳拉扬将前工业时期的摩尔古迪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家园，一个能有效联结个人历史与地方记忆的故乡：

我家住在摩尔古迪车站对面的一所小房子中。这所房子是我父亲亲手盖起来的……他亲手挖土，用井水和泥打成墙，用椰树叶铺成屋顶。他又在房子周围栽上番木瓜树。木瓜结实后，他便切成块儿出售。假如切得精巧，一个木瓜就能卖八个安那。我父亲还拥有一个用松木板和黄麻袋搭成的小店，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出售薄荷、水果、烟叶、薯叶、炒豆（用小竹筒量好出售），以及在通往摩尔古迪的干道上行路的人们所需要的其他货物。人们都把这个小铺称作“小棚店”。在小铺前总是聚集着成群的农民和牛车夫。^②

拉朱一家在以父亲亲手建造的小房子为圆心的同心圆中，仰仗大自然的馈赠，保持着稳定的生活。在这段描写中，作家将他关于“家”的抽象观念变为生动可感的生活场景，指出一个理想的“家”应当具备的因素：特定的自然区域、亲手建造的住所、互动的其他生命体。特定的自然区域表明了一个人的生态身份，亲手建造的住所令其生存的空间始终保持着对自我身份的记忆和与大地紧密联系，而“‘我’只有在其他动物中或者说只有通过‘其他动物’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才能获得自觉意识……它的发生先于任何认识，或者说，它是一切认识的源泉”^③，即只有通过与其他生命体的互动，个体才能在持续的群体认同中明确“我是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处所”，使身处其中的拉朱拥有一种持久而真实的在家感。

生态处所是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生态批评领域备受关注的生态理论，其核心概念“处所”指的是“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它决定、

①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476.

② 纳拉扬著，李南、王春景译：《向导：纳拉扬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③ 马修·卡拉柯著，庞红蕊译：《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79页。

影响和标记着人的生存特征、生态思想和人的生态身份，同时这个自然区域也受到在其中生存的人的影响和呵护”^①，而强调本地化和家园化是该理论的主要特征，这与纳拉扬排斥全球化的生活场所、追求独特的家园景观之观念异曲同工。拉朱对童年故乡的回忆充满依恋，与后来富裕奢靡的日子相比，往日在稳定处所中维持的简单生活，反倒让他的心灵倍感丰富和自由。拉朱一家的生活是摩尔古迪居民生活的缩影，他们紧紧依靠着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繁衍生息，有限的生产能力与活动场所并没有禁锢人们的心灵，反而令他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品味自己的平凡生活，勤劳地工作，从容地交谈和思考。此时未经工业改造的摩尔古迪犹如一个天人和谐的世外桃源，守护人们维持一种富足而充实的日子。

实际上，在纳拉扬生活的南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强调人与自然家园亲密无间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至今渗透在人们的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之中。在南印度，“家”有着非常丰富和独特的涵义，它往往包括房子、居住在房子里的人、房子周围的植被和动物、自然现象，有时还包括“家庭之神”与祖先的灵魂^②。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置换或抛弃的物理空间，它必须建立在一块特定的、承载了先祖记忆的、被自然之物包裹的土地之上，且必须与其他生命保持密切接触。如此一来，个人就能够与其他共时的生命、历时的灵魂共处一室，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也因此具有必要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这种与土地保持关联的强烈意愿表现在南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个人的名字中亦可窥见。纳拉扬的全名为 Rasipuram Krishnaswami Naranayanaswami，其中的“Rasipuram”就是其父辈祖籍村庄的名称^③，可见作家本身就浸润在富有土地情结的文化之中。成长于世代熟悉的生态处所，纳拉扬对故乡充分的了解和深厚的情感驱动他不断在作品中勾勒记忆中的理想家园，并令其笔下的人物同样在稳定的处所中幸福生活。

纳拉扬通过拉朱的童年记忆，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前工业时代的生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人与动植物彼此信任、互相做伴，在自然的环抱与滋养中和谐共生。除此之外，人们在稳定的处所中维持着恰当舒适的生活节奏和完满健康的精神世界，没有太多的物质束缚，也没有过度的欲望羁绊，因而对自然环境保持着友好的态度和有节制的索

①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2 页。

② Nirmal Selvamony, “From the Anthropocene to the Neo-tiNaicene”, *Humanities Circle*, No. 3, 2015, p. 125.

③ 王春景：《R. K. 纳拉扬的小说与印度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 页。

取。这一时期的摩尔古迪是拉朱记忆深处最亲密的故乡，也是作家心目中最适宜居住、最值得追求的生态乌托邦。然而，之所以称其为乌托邦，是因为它和拉朱自由自在的童年一样，在世界的变化发展中，停留在不可复追的往日时代。

（二）消费时代的生态困境

天人和諧、万物共生的乌托邦固然令人留恋，但工业文明的发展势头已然无法阻挡。随着火车站的竣工，摩尔古迪以往的宁静岁月便一去不复返了，火车满载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入村庄，加快推动了摩尔古迪的城镇化进程，拉开了消费时代的序幕，同时也让这片土地陷入了不同层面的生态困境。在纳拉扬眼中，摩尔古迪此时面临的生态困境不仅在于土地被日益商品化，更体现在逐渐异化的社会关系上，而这些变化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导致社会的整体失衡，更在微观层面上对人类个体造成隐蔽且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戕害。

消费时代的生态困境最先表现于被商品化的摩尔古迪。搭乘火车涌入摩尔古迪的，除了络绎不绝的外地游客，还有琳琅满目的精致商品、现代社会的消费模式和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拉朱的父亲被授权在火车站经营一家现代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以满足来往旅客的需求。拉朱积极地投入商店的工作之中，逐渐从童年走入青年，最终成为商店的继承人，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红极一时的导游。摩尔古迪的自然风光秀丽如初，但在拉朱的眼中却逐渐褪去了家园的色彩，曾经滋养和庇护他的摩尔古迪如今变成了比商店里的货物更加值钱的东西。他依据游客的财富，将摩尔古迪的景观分等兜售，尽情地享受这份既能抛头露面又能赚取佣金的工作带给他的利益和满足感。至于游客对自己赖以生存的故乡持何种态度，如何对待摩尔古迪神圣美丽的自然古迹，拉朱从不在乎。现代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隐秘地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基础关系，土地变成商品，家园变为资源，被商品化的自然在人们眼中不再具有值得尊重的主体性，沦为被肆意消费的纯粹的客体。此时的拉朱身处故乡却又仿佛失去了故乡，不再对自然表现出占有、保护的冲动，所作所为只有无数的讨好与算计。如前文所述，特定的土地是人们建造处所并从中获得家园意识的根本前提，而家园意识则是人们珍视土地、呵护特定区域的情感支持与内在动力。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不再因为需要从土地中获取直接生存资源和生存庇护而视其为可亲可爱的家园，

而因为土地能够提供免费的生产材料以满足个体的社会生产需求而视其为能被肆意滥用的手段。

除了人与大地的联系，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而改变，并更直接地反映出人对自然平衡的破坏。除了被分类推销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动物也成了摩尔古迪招揽游客、敛财牟利的工具。拉朱积极带领游客观看残忍的捕象表演，想尽办法满足人们观看猎杀各种动物的猎奇心理。如前文所述，拉朱的童年是在一片鸟语相伴、猪群为伍的祥和环境中度过的，动物是构成他赖以生存和成长之处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在回忆中追溯自我身份时最先选择的定位和参考。童年拉朱与动物亲密无间的关系，象征着彼时人与动物之间本然的基础状态。如今，拉朱依然无法离它们远去，但联系二者的纽带却不再是发乎内心的情感，而是出于一种刺激消费的需要。现代经济总能极其轻易地使人陷入一种单一而机械的思维方式，即将实用价值作为评价万物的尺度，在这一思维的指引下，甚至连生命也能降格为明码标价的物品，被剥夺一切抽象或超越的意义。拉朱和动物依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他们的关系和身份却被现代社会重新构建了——人变成商人，而动物变成了商品；他们不再是共生共长于同一家园的亲属关系，而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从属关系，这标志着摩尔古迪进一步走入了消费时代。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社会关系也有了相应的异化。纳拉扬通过女主人公罗西叶两段可悲的情感经历，展现出社会关系在消费社会的异化之深。罗西叶年轻貌美并受过良好的教育，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但由于她们家世代都是隶属于寺庙的舞女而被认为低人一等，她在家人的鼓舞下，舍弃一切自我与理想走入一段富裕体面却毫无情感可言的婚姻。罗西叶的活泼天性与生命激情被长久地压抑着，她对自己的能力和魅力一无所知，渴望家庭的温暖却又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地接受丈夫马可把自己朝思暮想的舞蹈事业比喻成猴子的表演。从表面上来看，罗西叶对不幸婚姻的忍气吞声来自印度教文化对妇女品德的要求，但从她和马可的婚姻建构过程来看，罗西叶在夫妻关系中所服从的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力量——金钱。对于马可而言，金钱能够直接买来一个貌美才高的妻子；而对于罗西叶一家来说，“结婚比其他许多职业更有利可图”^①，结婚能够最快地换来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能够洗刷她们在种姓上的耻辱，内外兼修的罗西叶连同她为自我起舞的权力，以及家族珍视的传统艺术，皆沦为商品。

^① 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从这一层面来看，罗西叶在婚姻中所感知的痛苦，不仅单纯地来自丈夫的冷漠，更是因为她在这段夫妻关系中始终被物化的现实。同时，罗西叶和马可的婚姻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印度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种种改变，金钱取代种姓、星象、道德、情感等因素成为判断婚姻是否值得的最高标准。随着现代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女性在获得更多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被物化的危险。

如果说马可对罗西叶的压迫所倚仗的还有传统的夫妇伦理和宗教律法，那么铁路拉朱则是以一种占有和利用物品的心态对罗西叶进行压迫和控制。善于讨巧的拉朱很快掌握了收获罗西叶爱情的关键，顺利地得到了她的信任并与其建立起情人关系。在罗西叶凭借精湛的舞蹈技艺声名鹊起之后，作为她的经纪人，拉朱也成为一位名利双收的上流绅士，他搬进了位于新区的豪宅，拥有一大班等待侍候的仆役，趾高气昂地出入各种场合，享受着周围不绝于耳的阿谀奉承，而他对罗西叶的爱情很快也发生了变化。名利双收的生活也在不断地强化拉朱的占有欲和嫉妒心，与往昔的车站商店和“铁路拉朱”的身份相比，罗西叶无疑是更私有化、更容易控制、更有利可图的赚钱工具。为了维持铺张奢靡的生活和缴纳巨额的所得税，拉朱不顾一切地为罗西叶安排尽可能多的演出，严格控制着她的社交范围和人身自由。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尊重与信任基础上的情感联结，此时在拉朱的世界里已全然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算计和猜忌的利益关系。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及其环境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随着人类逐渐从以家庭或社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前工业时期进入到机器大生产时代，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愈发紧密和强大。在同一种利益占有之思维的指引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如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般日渐紧张，深刻影响着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体认，破坏社会生态系统原本的和谐与平衡。

消费社会之价值观念还制造出了许多走向自我毁灭的“一元人”。在小说中，纳拉扬浓墨重彩地展现出拉朱从童年到青年时期丰盈完满的精神世界，表明故乡的大地犹如其生命之舟的船锚，在拉朱从童年走向青年的过程中始终稳定着他的人格与精神。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他对自我的体认也遭遇了疑难。在帮助罗西叶成功化身为娜丽尼之后，拉朱对自我的看法也起了变化：“我不再是昔日的‘铁路拉朱’了，我真诚地希望，我也能像罗西叶一样，顶着个新的名字，埋葬掉

自己的过去。”^①舞蹈事业的成功掩盖了拉朱过去那段备受众人嘲笑的人生经历，他急切地渴望抛弃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身份，离开昔日熟悉的社会群体。然而，人的自我认同往往需要群体认同作为前提条件，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往往建立在对整体环境确认的基础上，而这样的认同与确认必然具有不可中断的连续性。拉朱对过去人生阶段的否定令他对自我身份的体认建立在某种虚幻的真空之上，他机械地割裂了自我认知的连续性，也因此疏远了与内心自我的距离。

联系拉朱的人生轨迹，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抛弃旧有身份的行为与其处所生存的境况之改变息息相关。正如前所述，在摩尔古迪的前工业时期，人们在自然家园中获得了稳定的安全感和在家感，强烈的处所意识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周围万物的交互中保持着精神的健康与内心的完满。然而，“现代文明导致人类存在的处所性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去除，割裂了人类生活与自然的依附关系，污染毁坏了绝大多数人的家园……这就是处所剥夺。处所被剥夺的人们陷入了‘非处所’的尴尬。”^②与处所生存相比，在非处所中的生活让个人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变得短暂且不稳定，并由于非处所与个人之间并不存在情感基础与共同的历史记忆，二者之间是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二元关系，而非彼此依存于同一系统之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消费文化……或逼迫人们进入非生态的城市生活，或污染糟蹋了人们童年或祖先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处所”^③，一往无前的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让拉朱身处故乡却仿佛失去了家园，他一步步远离自然，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区域和相识已久的同乡好友，最终带着他新的身份离开了父亲亲手建造的家，搬入了被奢侈品和贵胄豪绅挤满的房子。

除了处所的改变，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还与工业社会“一元人”的观念有关。印度著名生态学家尼马尔·塞尔维莫尼（Nirmal Selvamony）指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单位是一元人，他既不自称神，也不与自然有任何亲缘关系……它是一项基于一元人的理念的事业，它不主张培养我们与自然或神圣的关系。”^④所谓“一元人的理念”，指的就是机械地把个体从其周遭的环境中割离，否定人与环

① 纳拉扬著，李南、王春景译：《向导：纳拉扬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

②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③ 同上，第204页。

④ Nirmal Selvamony, "From the Anthropocene to the Neo-tiNaicene", *Humanities Circle*, No. 3, 2015, p. 125.

境之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地把人类个体和自然视为算计或分析单位，放在扁平的二元结构里看待。在印度传统的自然观中，自然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自然与宗教、祖先的灵魂等具有同等的精神性和神圣性，它不仅参与人的现实生活，更与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反之，现代一元人的观念指引人类将自我从世界中抽离出来，让人类无法意识到自己是生态整体中的成员，对自己精神真空感的缘由一无所知，在物质现实中浑浑噩噩、无所依傍。1956年的美国之旅让纳拉扬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元人”的生活，在对身处异国他乡的印度青年的精神状态进行观察后，他感慨道：“在为新家配备了最新的洗碗机和录像带后，他又为车库配备了两辆车，一旦他获得了其他人所有的东西，他就和家人坐在一起，数着自己的幸福。外表上快乐，却被一些模糊的不满所折磨，意识到一些他无法定义的内心动荡或真空。”^①他们似乎得到了自己追求的一切，却也失去了本就拥有的东西，失去了一些超越的、不可言喻的、对人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灵支撑，从而陷入内心无所依傍的虚无感。

（三）生态理想的重新追寻

站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的纳拉扬，深知在物质文明的发展模式和现代社会的进化结果上，美国的今天即是印度的明天。作为一个天生热爱自然，且始终对工业文明保持批判态度的作家，不免对印度未来的生态境况感到担忧。一方面，纳拉扬达观乐天的性格让他既不允许自己笔下的人物一味地消沉于机械文明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摩尔古迪不能沉湎于过去的乌托邦而对当下的生态现实视若无睹。因此，纳拉扬试图寻找一条通往生态理想的新道路，其笔下的拉朱也由此迈上了回归自然与本我的返乡之旅。

尽管原始生态乌托邦的破碎已成现实，但近几十年来人们积极调整与自然之关系的行动表明，生命对自然与自由的向往还是驱使着人类努力回归到自然之中，试图实现在大地上的“再栖居”（reinhabitation）。“再栖居”又翻译为“重新栖居”，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生态术语，是一个与处所理论唇齿相依的重要概念。生态批评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对其内涵的阐释尤其影响力，他指出“重新栖居指的是小部分人走出工业社会，开始回到土地，

^①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238.

回到地方。它要求生命对地方忠诚，这既是道德的选择也是精神的选择”^①。从个体角度来看，再栖居或许只是个人出于某些具体需求作出的偶然性选择；但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再栖居是人类顺应自然性而走上的必然之路；而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这是人类重建自我与环境之关系以缓解生态危机的重要路径。

在纳拉扬笔下，尽管拉朱最终锒铛入狱，为自己的犯罪付出了两年监禁的代价，但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此走向衰落。监狱的围墙隔绝了繁华浮躁的世俗世界，反倒让拉朱的精神世界在返璞归真中重新焕发活力，更让他重新获得了回归自然和品味生活的能力，自然万物在他眼中又焕发出勃勃生机。监狱的围墙阻挡了名利纠缠与物欲洪流，仿佛将拉朱带回了遥远的过去，将他带回那个与自然交融的童年。从拉朱与自然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城市生活将他的身心与自然相隔开来，但他并没有完全失去感受自然的能力，他的内心仍存留着强烈的爱自然的本能。失去了堆满物品的豪华住宅，却在监狱里的一块菜地上获得了久违的在家感；离开了城市中日复一日忙于交易和算计的生活，却在简单的土地劳动中获得了满足感与价值感。通过对比拉朱入狱前后的状态，纳拉扬再次重申了处所生存的重要性，并向读者暗示了现代人历经繁华虚无后再栖居于大地的可能。为自己建造处所，实现在大地上的再栖居，这一观念之生态价值不仅在于它引导个体去维护某一具体的小范围的自然区域，还在于它能够帮助人类用一种看待处所的眼光去对待我们所生存的这颗星球。

除了为身心建造新的处所，实现生命的再栖居，简化生活也是纳拉扬作品中的重要思想。在谈论理想的生活方式时，纳拉扬时常将繁杂的物质生活和空虚的精神生活结合起来，指出在前者上的过度投入是造成后者的根本原因，他在亲身经历后感慨道：“我越来越多的时间被占用了，不是阅读、写作或沉思，而是拼命地寻找一些东西……这都是由于一个人积累无关的零零碎碎的倾向，这对一个人的福利或明智的生活都不是必要的。”^②在现代社会，人类在物质层面的享受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匮乏资源的限制，但追求和维持物质上的丰富需要个人付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社会不假思索地保持高效生产以保证经济系统的快速运转，这对于社会个体和整体而言都不是一种“明智的生活”，因此简化生活的理念和行动变得十分关键。

透过拉朱对过往的叙述和评价，纳拉扬将自己对现代社会过度物

① 宁梅：《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206—207页。

②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185.

质化的否定以及对简化生活的追求贯穿于小说之中，表现出对物质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在摩尔古迪的城市化刚为拉朱家带来红利时，拉朱的母亲就时常指责丈夫不必要的消费，她始终认为丈夫置办非生存所需之物纯粹是为了满足他那强烈的虚荣心，作家也借着童年拉朱的童言童语对经济社会的运转模式表示嘲讽：“我记得，当父亲去远处购物时，有个问题总在我脑海里嗡嗡作响：‘爸爸，既然你本身就是个店主，你干嘛还要转来转去地去到别人的店里买东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①在拉朱成为摩尔古迪著名的导游而退出对商店的直接经营后，母亲也曾质疑拉朱口中诱人的名利，问道：“可是，你父亲不是也卖这些东西吗？难道他过得不够好吗？”^②然而，被金钱主义和物质主义裹挟的个体正是因为无法反思“生活是否足够”而迷失，因为一味走向“更多”而陷入失衡的处境。在拉朱住进那幢奢华的大房子后，他仿佛坠入了物质的深渊，过着一种极其复杂却又十分肤浅的生活：

我在大厅的沙发上接待他们，还按铃为他们要来咖啡。我昼夜为我的小圈子的来客们提供咖啡。单是咖啡一项费用，每月就高达三百卢比，足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舒适地生活一个月。大厅的一切陈设都很奢华，有黄铜嵌花托盘，象牙小摆设，还有娜丽尼居中的团体照。^③

我计划要尽快地大量投资，一旦我们的支出稍有结余，便将其付诸实施。不过现在我已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奢靡的生活，无尽的请客招待，耗尽了我们所得的全部钱财。有时她会说：“咱们只有两个人，每月却要花费两千卢比。难道我们就不能生活得简朴些吗？”^④

无论是与童年时期节俭朴素的生活相比，还是与在监狱和圣坛上毫无物质享受可言的苦修生活相比，这一阶段的生活反而让拉朱更进退维谷、心事重重。他的一切劳作都是在为了堆满四周的物质服务，自己却不能拥有片刻享受轻松和悠闲的时间。消费社会鼓励人们将物质享受作为最高享受，教导人们将精神体验视为缥缈的、可笑追求，

① 纳拉扬著，李南、王春景译：《向导：纳拉扬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同上，第167页。

④ 同上，第174页。

实际上是在压抑人们反思和否定现有社会的能力，使人们在舒适中逐渐变成单向度的群体，使社会在缺少否定和反思的状况下保持一种非良性状态。结合《向导》的创作时间，拉朱这段奢靡而迷失的生活可以看作纳拉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个体生活的复写，他曾在深入观察美国现代城市生活后评价道：“美国的重点是物质获取和对繁荣的无限追求……美国人对永恒有着强烈的冷漠……他努力认真地工作，获得财富，享受生活。他没有时间担心来世，只是小心翼翼地起草一份合适的遗嘱，并相信殡仪馆会照顾好其余的事情。”^①在纳拉扬看来，这样的生活是本末倒置的，因此只有简化物质生活，并信仰简化生活的思想，才能让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关照自我内心与品味精神生活等事务上。

在观察了物质主义所引导的现代生活之后，印度传统的重视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在纳拉扬眼中变得更加可贵，他指出“印度哲学强调节俭和不受阻碍、不复杂的日常生活……印度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观念：节俭和知足的生活是好的”^②。由于更加重视建立内在的力量，印度比其他一味追求现代化和经济化发展的地方更注重对内在生活的投入，因此也更多地赋予并维持了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由此可见，纳拉扬倡导的简化生活指的是简化物质生活，而简化物质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深化精神生活，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异化危机的历史时期守护人类生命的本真。

正如前文所述，一个生态系统的根本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层面，试图撇开精神生态层面的困境去解决自然生态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舍本逐末，无法真正地对整个失衡的生态系统进行调整。因此，简化生活不只关涉个体的私人生活，更指向生态系统的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是在现代社会实现生态理想的具体实践。人们之所以时常怀念过去时代的自然环境与天人关系，是因为在生产技术受限的时代，大多数农业人口只是为了生存而消耗自然资源^③，人们因感到自然才是最无限且丰富的存在而呵护着自然。正如生态学家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说：“他们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什么；他们很穷，因为他们不用有什么，结果他们没有去奴役环境。”^④历史不可倒退，未经污染、如其本然的生态乌托邦早已破碎，人类也不可能抛弃现代

①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239.

② *Ibid.*, pp. 239-240.

③ 加吉尔、古哈著，腾海键译：《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④ 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文明回到原始的自然家园，但简化生活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有助于人类回到自然之中，去发现并珍惜自然本身自有的价值。

二、《向导》中生态思想的来源探析

作为一个立足于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作家，纳拉扬终其一生都对不同文化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也导致了其生态思想具有一定的混杂性与矛盾性。以下将结合纳拉扬本人的生平经历和小说的创作背景，探析纳拉扬生态思想的现实来源和文化根源，以期从生态批评视角对小说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一）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

从两岁开始，纳拉扬就被父母送到了马德拉斯的外祖母家，并在外祖母和两个舅舅的照顾下度过了整个童年。马德拉斯是南印度最早受英国殖民影响并率先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之一，而后由于东印度公司和皇室之间不断地赠予和吞并，马德拉斯在19世纪一度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先驱地位。尽管如此，“马德拉斯的总督们一直保持着傲慢、腐败和镇压的统治，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地方财富。其结果是，南印度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乡村社区遭到破坏，乡村工业遭到毁灭。在农村地区，小生产者发现自己被剥夺了财产，负债越来越多……饥荒和严重粮食短缺的幽灵始终围绕着马德拉斯”^①，自然生态环境被肆意践踏，社会生态面临坍塌，而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混乱中不知所向。马德拉斯在现代化发展中饱受苦难的经历写进了纳拉扬的家族历史，并作为故事在纳拉扬的成长过程中被反复讲述，最终“在纳拉扬的小说中找到遥远的回声”^②。

随着铁路系统与其他现代基础设施的完善，马德拉斯终于在20世纪初又一次成为南印度的重要都市，但这座城市“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由大片开阔或耕地隔开的小城镇和村庄的结合”^③。在纳拉扬的

① Susan Ram and N. Ram, *R. K. Narayan: The Early Years: 1906—1945*,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P)Ltd., 1996, p. 7.

② Ibid., p. 7.

③ Ibid., p. 32.

记忆中，马德拉斯的街道上既有缓缓行驶的电车，又有“带着竹梯、破布、火柴和油的点灯人”^①，既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开设的现代商店和电影院，又有由粗糙的棚屋和茅草房聚集起的贫民窟；“而在商队来往的地方，又似乎充满了险恶的可能性”^②。现代化在带来新的文明和秩序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野蛮和肮脏，在为人们创造富裕和娱乐的同时也破坏着他们原本的家园，这些矛盾和冲突充斥着纳拉扬的童年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引发了他对现代化发展之利弊的关注和思考。

直到高中时，纳拉扬才离开马德拉斯回到父母身边。因父亲工作的调动，纳拉扬一家先是前往哈桑度过了一年，后来又举家搬迁到迈索尔。哈桑和迈索尔是两个与马德拉斯截然不同的地方，“哈桑地处偏远山区，那里流传着森林强盗以及老虎的故事，这些都给他留下了神秘与刺激的印象。迈索尔美丽的风光又使纳拉扬与自然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美丽的风景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感受力”^③。马德拉斯被商队和汽车破坏的自然乡村景观，仿佛在哈桑和迈索尔得到重现。纳拉扬与山川丛林和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滋养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发现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尚在现代城市之外。青少年时期回归山林的人生经历，对纳拉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仍然写道：“即使在今天，在游览了世界上许多地方之后，我也敢断言，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迈索尔那样见证如此壮观的日落。我会坐在水箱上的长凳上，看着太阳的表现，看着天空的颜色逐渐消失，看着黄昏时第一颗星星的出现。”^④

迈索尔壮观的日落成为伴随纳拉扬一生的乡愁，哈桑那未被工业文明侵染的世界也变成作家魂牵梦萦的生态乌托邦，而马德拉斯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镶嵌在作家的童年生活中，成为他对工业文明的早期印象。追溯纳拉扬的成长环境，仿佛看见了摩尔古迪在不同阶段不同面貌的原型；结合作家本人对本地环境的感受和思考，理解拉朱从一个自然之子沦为城市一元人的命运也有了依据。原始古朴的自然环境与飞速建立的现代体制在作家眼中交替展现，二者强烈的反差为纳拉扬思考生态问题提供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材料，也为他书写

① Susan Ram and N. Ram, *R.K. Narayan: The Early Years: 1906—1945*,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P)Ltd., 1996, p. 32.

② R. K. Narayan, *My Days: A Memoir*,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9, p. 5.

③ 纳拉扬著，李南、王春景译：《向导：纳拉扬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④ R. K. Narayan, *My Days: A Memoir*,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9, p. 55.

摩尔古迪的故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如前文所指，纳拉扬的生态思想更多地指向个人层面，在他探讨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精神世界的关系时，往往都是从个体角度出发，暴露问题，提出对策。诸如简化生活、建造处所、关注人的自然性等思想，都表现出纳拉扬是一个更关心个人生活的作家，哪怕他书写的是一场在现实中发生的生态灾难，他也坚持要以表现生活流的方式娓娓道来，并始终将小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作为写作的重点，平静地去表现他们的一生。因此，纳拉扬的写作与大部分的生态小说家有很大区别——他既不讨论宏观的生态问题，也不在叙事过程中直接穿插关于生态的议论，更不会一味用灾难性的书写来引起读者的恐慌情绪，因此《向导》这部小说很难让人将它与传统的讨论生态灾难的小说联系起来。

纳拉扬曾经表示：“我只对个人感兴趣，我对‘民族愿望’这个词极为怀疑，它矫情而虚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和生活。如果你谈论一个人的问题、希望和愿望，你会更接近目标……”^①而他关心个体生活、避谈宏大问题的性格，是在外祖母和舅舅耳濡目染的教育下逐渐形成的。从2岁到16岁，纳拉扬在与外祖母共同度过的14年时光中受到了她许多观念上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不多管闲事、坦然接受一切的生活态度，“不去分析事情，不去期待事情，不去说这是对是错……接受生活的每一天”^②。对纳拉扬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他的一位舅舅，这位对西方文学充满热情的长辈在文学上给予了纳拉扬最早的启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纳拉扬的政治观。

1916年，纳拉扬误打误撞地参加了一场有关抗议《罗莱特法案》的示威游行，回家后受到了舅舅严厉的谴责，“他反对政治，不希望我被误导。他谴责所有的统治者、政府和行政机构都是撒旦，认为寻求更换统治者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③。因此，纳拉扬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只记录个人生活，不评判宏观问题，只观察他人，不介入社会的思维习惯，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表现生态问题时仍然选择聚焦个体生活，书写个人故事，给予个人指引。

另外，纳拉扬很少让笔下的人物和地方走向绝境，他始终相信失衡的一切终会再次平衡，正如拉朱没有在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和沦为

①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174.

② Susan Ram and N. Ram, *R. K. Narayan: The Early Years: 1906—1945*,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P)Ltd., 1996, p. 5.

③ R. K. Narayan, *My Days: A Memoir*,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9, p. 13.

阶下囚的命运中彻底毁灭，摩尔古迪也没有在旱灾中变成荒原，纳拉扬最终还是让这一人一地在新的生态理想中焕发新生，这样的表现也与作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在使用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中，纳拉扬是为数不多的完全土生土长的一个，直到年过半百才带着旅行的心境迈出印度国门，对印度深刻的了解与强烈的爱国情感让他在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异国城市时仍然保持着坚实的民族立场，但也对祖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牺牲原有的自然、平衡和完满感到痛惜。然而，纳拉扬又是倚靠着印度现代化红利成长起来的一代，他深知现代世界是不可抵挡的，尽管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祖国作为殖民地被迫现代化的过程中，“英国人本质上是商人，而印度主要是一个市场”^①，但他也无法否认印度在成为一个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冲突的立场反而让纳拉扬在面对生态问题时能够保持客观和清醒，他既没有像奈保尔等移民作家那样站在现代文明的一端鞭笞印度的落后，也不像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对工业文明投以强烈的批判并大声呼吁回归原始自然。因此，他往往选择用一种坦然接受的中立态度来对待变化多端的现实，用悬而未决的故事让人保持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由此他笔下的世界从未走向一个盖棺定论的结局，正如他对生态理想的追寻从未随着生态乌托邦的破碎而停息。

（二）印度传统自然观的影响

尽管在纳拉扬的一生中有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对他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塑造了纳拉扬作品中的深层结构与核心思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作家，纳拉扬的生态思想必然携带着印度传统自然观的基因，蕴含了这个古老国度关于人与自然的诸多思考。

如前文所述，纳拉扬在《向导》中表现出明显的土地情结，对于在特定的自然区域中过一种稳定的处所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向往。实际上，在纳拉扬成长的南印度，对人一地情感的关注和描绘自古有之，对人与自然之情感的歌颂是古代泰米尔文学的重要主题，这可以通过对印度古代生态术语提奈（Tinai）的分析见得一斑。提奈是古代南印度著名的桑贾姆（Samgan）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生态术语，它生动描述了印度土著人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印度人民对人与自然关

^①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229.

系的理解。一般情况下，一个提奈结构由三个元素共同构成：时间和地点（mudal）、自然景观/动植物群（karu）、行为细节/情感（uri），“每一个提奈都与地理元素、季节、一天中的时间、职业和人际关系中的情绪有关”^①，许多南印度的作家通过提奈叙述将特定的自然区域和人类的情感相联结，表明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活的节奏是对应、共存、融合的。同时，提奈还尤其强调人与自然是基于爱的亲属关系，动植物是人类的近亲，以居住的房子为中心，周围的一切自然与超自然之物都应被看作是共同栖居于一地的亲密家人，而这些观念在《向导》中都有所表现。提奈理论强调的本土性、小规模性和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性，一方面影响了南印度作家的文学创作，使许多南印度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土地情结，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生态特征；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创作又在持续加深人民对土地的情感，引发人们对人一地关系的思考，从而使这类文学作品具有了生态哲思的意味与功能。这种对自然有着深厚情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培养了纳拉扬热爱自然的性情，也使他的生态书写表现出深厚的情感特征。

（三）英美现代生态观

虽然纳拉扬年过半百才迈出国门，但其一生都受到了英美文学和文化的浸润。而对他的生态思想之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思潮和稍后在美国声名鹊起的超验主义思想。

在举家搬迁至迈索尔后，纳拉扬意外获得了一整年自由徜徉山林的时间，让他远离压力和繁琐，用全部身心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同时，纳拉扬的父亲正担任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纳拉扬由此拥有了良好的阅读资源。或许是受到迈索尔自然风光的影响，这时的纳拉扬对那些歌颂自然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其中最令他为之动容的，就是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关于这段经历，他在晚年回忆录《我的日子》中写道：

每天早上，我口袋里揣着一本书离开家，绕着库卡那哈利坦克散步。它可能是帕尔格雷夫的《黄金宝库》，或者泰戈尔的《吉

^① Meera Baidur, "Nature in Ind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Sophia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 of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No. 12, 2015, p. 133.

檀迦利》，或者《世界经典》中济慈的篇章。绕着水池走了一圈后，我在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坐了下来，打开书，一边读，一边观察着潜水的水鸟。当然，还有在迈索尔随处可见的牛和山羊，在我周围悠闲吃草。^①

我觉得自己被引入了大自然荣耀的秘密，帕尔格雷夫、济慈、雪莱、拜伦和勃朗宁的作品也对我产生了相同的效果。他们讲述了一种在我周围环境中真实而直接的经历，并在我内心激起了深刻的反应。^②

歌颂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诗篇，让本就身处自然之中的纳拉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由此对大自然有了更异于常人的敏锐的感受力，这些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纳拉扬生态思想之核心的形成，即原始的和自然的才是最好的。除此之外，纳拉扬在这一阶段所读的浪漫主义诗歌更是对他早期的写作风格和题材选择起到了指导作用。纳拉扬正式创作的第一首名为《友谊》的诗歌，就是在模仿雪莱的著名诗篇《阿多奈》的基础上完成的^③，而在他之后创作的小说中，也存在着大量颇具浪漫主义风格的自然环境描写。

尽管纳拉扬本人没有在回忆录中对这些浪漫主义作品背后的生态价值展开讨论，但值得关注的是，18至19世纪兴起的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向来被认为是生态文学的重要源头。著名生态批评学者胡志红指出：“西方思想文化界借助这次文学、文化思潮对现代科学和新兴工业技术革命第一次发起了广泛而强劲的‘绿色’批判，同时也第一次明晰地表达了‘生态冲动’……就浪漫主义自然观而言，其强调关系、相互依存及整体主义，因而浪漫主义自然观基本上称得上是‘生态观’。”^④纳拉扬所钟爱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作为浪漫主义自然观的重要载体，往往将工业文明与原始自然并置，凭借对大地的强烈情感明确表现出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因此有理由相信，《向导》中拉朱在自然村落和现代城市中截然不同的状态，以及作家表现出的对商业化自然、高度物质化生活的质疑与排斥，对原始自然的怀念和赞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启发。

除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自然观，之后在美国大陆兴起的超验主义思

①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55.

② Ibid., p. 56.

③ Ibid., p. 174.

④ 胡志红：《生态文学讲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潮也对纳拉扬的生态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小说中，纳拉扬对拉朱狱中生活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记录的一段自给自足的躬耕生活。实际上，《向导》的创作时间正好就是在爱默生、梭罗等美国自然作家开始在印度受到关注的20世纪50年代。彼时印度学界开始对欧美生态文学展开系统的研究，并逐渐指出印度关于自然的古老哲思对欧美的超验主义产生了何种影响^①，从小就对自然有着强烈情感的纳拉扬自然而然地会对这类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产生关注。在《印度与美国》(*India and America*)一文中，纳拉扬也直言道：“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仍在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这需要时间，但最终人们一定会听说林肯、爱默生、马克·吐温和梭罗。”^②可见纳拉扬对爱默生、梭罗等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有着相当的认识。在体验过国内外各种城市生活之后，纳拉扬更是萌生了返璞归真，去过一种原始的躬耕生活的想法，对此他更是坦言“这或许是阅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和类似作品的原因”。^③

梭罗“主张简化物质生活，优化精神生态，过一种‘低物质消耗的高品位生活’……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他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他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④，由此他同样对扭曲人性、异化自然的现代工业文明展开了广泛的批判。《向导》写就于纳拉扬旅美途中，彼时他正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利与弊保持着高度关注，梭罗作为纳拉扬心目中美国作家的代表之一，可以推测其生态思想给纳拉扬创作《向导》带来的启发非同一般。本文认为，纳拉扬在《向导》中表现出的反对异化社会关系、主张再栖居于大地、简化生活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梭罗《瓦尔登湖》的影响，或者说梭罗的生活实践经历进一步深化了纳拉扬对现代生存方式的思考，增强了纳拉扬生态主张的实践性。

综上所述，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深厚的印度传统自然观，以及现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和美国超验主义思想，都在不同阶段对纳拉扬生态思想之形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承载着印度传统自然观和现代英美生态观的文学作品也在艺术层面指引了纳拉扬的题材选择，塑造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并最终呈现在《向导》之中。

① 杨婕：《东方与西方：印度的梭罗研究综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10期，第22页。

②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233.

③ R. K. Narayan, *My Days: A Memoir*,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9, p. 174.

④ 胡志红：《生态文学讲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三、《向导》中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下，地球生态久未治愈的旧痛和层出不穷的新伤令人倍感担忧，社会生态危机四伏，精神生态弥漫普遍的不安与困惑，人类和地球一样亟需拯救和改变，而此时文学也应当承担更多指引人们走出生态困境的责任。《向导》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在生态状况岌岌可危的当下时代，也由此显现出丰富的价值。

首先，《向导》中的生态思想为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态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指南。通过了解拉朱一生的经历，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现代个体如何被经济社会进行工具化改造，并在经历处所剥夺后沦为“无家可归者”而陷入自我认知疑难与精神真空。尤其是对于见证技术革命和快速城市化的现代人而言，拉朱从自然之子向一元人的转变或许会引起他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入思考，并唤起他们对自然故乡的情感，从而激发他们维护处所、亲近自然的生态意识。而对于出生成长于城市中心的一代人来说，《向导》对前工业时期生态乌托邦的描绘也会引导他们思考人类在城市之外的身份和位置，主动关注和感受自身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关系。在许多生态文学作品中，作者提出的生态策略往往都是宏观层面的思想启示，读者很难从其中获得具体可行的实践指引，会认为生态问题对于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自己而言遥不可及。而纳拉扬是一个善于观察和书写小人物的作家，他的生态思想也更能够在个体层面为现代人提供行动指南。比如寻找一处能够给自己带来“在家感”的地方建造处所，由此与地方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系，从而使个体致力于维护这一区域内的生态平衡；简化物质生活，深化精神生活，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通过改变人们的生存追求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造成的长期破坏等等。除此之外，纳拉扬关注个人生活的生态书写还指向了一个重要内涵，即生态与每一社会个体都息息相关，全人类生态理想的探索 and 实现需要依靠个体的思索与行动。只有唤醒个体的生态意识，引导他们关注自我的生态生活，人类或许才能共同迎接生态时代的到来。

其次，《向导》重申了印度乃至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深刻性，对

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启蒙”^①具有重要意义。在评价纳拉扬所描绘的印度社会时，学者杨晓霞谈道：“在那特定的年代，印度社会既不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固守着僵化、落后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征服，迅速被外来思想观念所同化，而是进入了一个过渡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进退，各有得失，非黑非白，黑白相间。”^②这既可以用来形容纳拉扬所处的那个年代，也可以用以形容纳拉扬生态思想的主要特征。纳拉扬生态思想的闪光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从历史的比较的视野出发，发现传统理念的当代价值并试图用以弥补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不足。在比较印度和美国截然不同的生活理念时，纳拉扬就曾明确指出：“美国和印度在态度和哲学上有着深刻的不同，如果它们能在价值观上互补就太好了。”^③在西方现代思想和印度传统观念之间，纳拉扬始终保持着自己温和而坚定的立场，他在承认现代文明为人类带来种种便利和进步的同时，也仍然对自己民族坚守的自然精神表示肯定和赞美，他看见了现代物质文明中的缺陷，同时他也意识到印度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能够拯救现代人于精神的动荡和虚空。

通过《向导》，纳拉扬重申了自然具有神圣性、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万物有灵的生命观等传统自然观，启发读者思考自然本身所自有的存在意义与价值；通过展现前工业时代的生态乌托邦图景和乡村工业化过程，引导读者思考工业文明是否就是最值得人类追求的文明。纳拉扬这种看似“复古”的生态思想也正是现代社会“第二次启蒙”所呼吁的主张。鲁枢元在《第二次启蒙与东方精神》中指出，“过去300年里，笛卡尔式的启蒙理性之光已经使人类陷入‘整体的无明状态’，启蒙的结果竟制造出弥塞天地的‘启蒙之蒙’”，“从社会实践看，正统的启蒙理念对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情感与精神领域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④，这也就是在经历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时刻之后，人类面临的清澈过后的荒凉。旅美学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在其著作《第

① “第二次启蒙”通常也被称为“生态启蒙”，是反对发生在17至18世纪欧洲的高扬理性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之内在局限而提出的概念。中国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在《第二次启蒙》中对其内涵进行了具体诠释，主要概括为高扬生态意识、推崇东西方文化互补意识、提倡深度自由和道义民主、超越纯粹理性而呼唤审美智慧等。参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杨晓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前行——R. K. 纳拉扬早期小说解读》，《南亚研究》，2007年2期，第86页。

③ R. K. Narayan, *A Writer's Nightmar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8, p. 239.

④ 鲁枢元：《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76—77页。

二次启蒙》中表示，现代社会亟需第二次启蒙，而这次启蒙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前现代社会历史演替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同时还要发扬和培养对自然的审美智慧，“与现代理性视周围的世界为无生命的物质，使自然‘祛魅’相反，审美智慧则使自然复魅。审美智慧教导我们，自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尊严和美。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它，感激它，欣赏它”^①，这也正是纳拉扬通过《向导》向读者传输的重要观念。纳拉扬在《向导》中的生态书写宛如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一端继承了深刻的印度生态智慧，一端融入了现代社会正悄然进行的第二次启蒙，为人类以“复魅”之力弥补“祛魅”之憾注入一缕艺术和精神的力量。

《向导》对当代生态叙事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似乎从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于1962年出版开始，灾难型的题材就被视为生态叙事的主流题材，至今仍频繁地出现在读者和观众的视野之中。诚然，在人类对工业文明发展持狂热态度的年代，灾难型的生态叙事（尤其是生态小说）的确比爱默生、梭罗等注重呼吁人类体会自然之美的作品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紧张，从而起到一种更直接的警告效果。但是，当灾难型生态叙事多如雨后春笋，高频率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它是否还能发挥出唤醒人类生态意识的功效？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认为，当下讲述大灾难的故事容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或者导致人们丧失信念，从而走向虚无主义。对于作家和其他故事叙述者，包括电影制作人以及研究这些作品的学者而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观众、读者中激发出直面脆弱的正向的、积极的力量，而不是使人们放弃个人或政治方面的努力。”^②生态叙事的职责，不仅在于暴露和批判现代社会中种种显性或隐形的生态危机，更在于给予人们希望与方向。虽然《向导》向读者展现了工业文明野蛮的一面，描绘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纳拉扬却用他一贯的幽默风格和讽刺手法弱化了这些生态问题带来的严肃感和恐惧感。因此，尽管小说书写的是一场悲剧，但它的语言和结局却是昂扬的，不仅没有让人产生一种无可言说的沉重，反而使故事显得意味深长。

同时，《向导》还可以被看作一部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相结合的小说，一方面纳拉扬将自己对工业文明和技术社会的观察融入拉朱的

①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② 姜礼福：《人类世、气候小说及环境人文新趋势——斯洛维克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2023年2期，第176—177页。

一生，真实地再现了南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他又在故事中保留了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因素，让上天在拉朱的祈雨苦修中再降甘霖。纳拉扬没有将生态问题从始至终地暴露在科学的强光下，而是制造出一种介于现实和超现实的张力，避免读者的思考随着故事中灾难的尘埃落定戛然而止。同时还应该看到，故事中的超现实因素在印度实际上也属于一种现实因素，因为它就真实发生在给予纳拉扬创作灵感的迈索尔的一场旱灾当中^①，而这种祈求神灵庇佑以解众生之苦的行动，其背后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信仰。在现代社会仍然应该让人们看到这种信仰积极的一面，而不是一味被当作传统自然观的糟粕而被生态叙事者所抛弃。将深刻的社会批判和自然哲思、美好的生态理想与切实的行动指南融入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通俗故事中，是从生态批评角度看《向导》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给予当代生态叙事的重要启发。

四、结语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生态批评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后，生态问题就不仅是人类在处理现代发展和环境危机之关系时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予以思考和关怀。

在现实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唤醒人们意识的过程是艰难的，愤怒会被遗忘，口号会被淹没，这是许多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缘由，也是纳拉扬认为奔走呼号无济于事的原因。《向导》像是给生态危机时代中的个人书写的一剂良方，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向导》，无论是对于挖掘纳拉扬作品的当代价值，还是为思考当下的全球多维度的生态危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丽]

^① 纳拉扬在回忆录《我的日子》中陈述了他开始写作《向导》的过程：“迈索尔最近的局势为这样一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背景。一场严重的干旱使所有的河流和水库干涸……作为一种孤注一掷的手段，市政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祈雨。一群婆罗门站在卡韦里（Kaveri）干涸的床上，在齐膝的水里（花了很多的钱才弄到的）禁食、祈祷，并连续 11 天念诵某些咒语。第 12 天下雨了，给乡村带来了解脱。这就是《向导》真正的出发点。”参见：R. K. Narayan, *My Days: A Memoir*,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9, p. 164。